

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济与社会成效研究

·岳云霞

内容提要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普遍向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强调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拉美地区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都有所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也呈较大幅度的上升。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引发甚至加剧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社会稳定。与拉美相似,中国也经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转变的发展模式的调整过程,当前经济具有较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拉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经济成效和社会成效,总结其近 30年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关键词 外向型发展模式 经济成效 社会成效

20世纪 50~80年代,拉美国家推行的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使该地区处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但这一模式同时也使拉美国家的国民经济处于封闭式的内循环中,其内在的缺陷集中地体现为“小政府”支撑“大支出”以及“小出口”维系“大进口”。具体而言,拉美地区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的政策核心是对内对外实行双重的保护政策。在对内保护方面,拉美国家强调政府职能,依靠国家力量在高度保护下发展民族工业,但却使得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不断攀升,经常出现财政赤字。在对外保护方面,它们高筑贸易壁垒,极力降低经济对最终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转而进口发展民族产业所需的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形成了以低附加值出口支撑高附加值进口的贸易格局,整个拉美地区长期处于贸易赤字状态。

在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重压力下,从 70年代起拉美国家被迫走上了举债发展之路,外债规模呈滚雪球式的增长。1982年 8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先后陷入债务清偿危机。为了缓解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建议下,拉美国家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逐步实现了由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变。整体来看,拉美“外向化”调整政策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推行贸易自由化,实施投资自由化,推动经济一体化,

实施外向型的配套改革。

一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济成效

(一) 经济开放性加强,但经济独立性下降

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拉美国家实现了由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开放度得以提高。1980年,在拉美地区的 GDP中进口所占的比重为 14.9%,出口所占的比重为 10.2%;在实施“外向化”转变后,进出口在拉美经济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二者在 GDP总值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1985年和 2005年进口和出口占 GDP的平均比重分别为 43.5%和 36.7%)。与此同时,FDI在拉美经济中的地位总体呈上升趋势,90年代中期后 FDI占 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 4%左右的水平上。

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拉近了拉美国家之间及拉美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世界经济或拉美局部地区经济的变化都会对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一方面,多数拉美国家经济依赖于附加值较低的原料出口,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会对出口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对其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拉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局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很容易扩散到整个拉美地区。发生于 1986年、1999年和 2001~2002年的三次经济周期低谷最初都源自个别国家。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影响下,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无法摆脱世界经济发展大背景的总体影响。尤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拉美小国,其独立性较差,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较弱。

收稿日期: 2009-08-10

作者简介:岳云霞,女,2005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岳云霞
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济与社会成效研究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二）贸易与投资双增长，但伴生国际收支失衡

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导下，拉美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都有了明显增长。1985年，拉美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仅为1926.8亿美元；在此后的20年中，拉美贸易总额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至2004年拉美国家的贸易总额达9239.8亿美元，2006年进一步升至1.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拉美地区吸引的外资总额整体上也呈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68.9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1328.7亿美元，年均增长近20%。

不过，拉美国家贸易和外资的增长仍主要依赖于由自然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这导致其国际竞争力有限，对外部门始终处于收支不平衡的状态。就贸易而言，拉美进出口中长期存在结构性失衡。1985~2005年，初级产品（主要是基本食品、金属、矿石和燃料）在拉美出口中的比重一直超过40%，而在工业制成品中，化工制品和钢铁等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份额。与此同时，拉美进口产品中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长期居主导地位。进出口结构决定了拉美出口的增长主要源于“数量积累”，进口增长则源自“价值积累”，这使得拉美的进出口发展并不平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就外资而言，拉美地区优惠的外资政策，使该地区成为全球FDI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但外资的流入并未形成拉美自有的国际竞争力，因此，这一地区在引资水平和GDP总量增长的同时，并未出现对外投资的相应繁荣。2006年以前，除巴西和墨西哥在对外投资方面相对活跃外，其他拉美国家的对外投资乏善可陈。

（三）外资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有限

在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引导下，FDI大量涌入拉美，跨国公司成为FDI的主角。跨国公司及其引进的FDI对拉美经济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其直接刺激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外资在拉美资本积累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外资存量在拉美固定资本构成中的比重由1985~1990年的年均4.15%逐渐升至2000~2005年的年均17.21%。二是外资推动了拉美的出口。在拉美出口较多的200家企业中，外资所占比重一度曾高达47.5%（2000年）；在制造业出口企业中，外资所占比重为41.2%，外资已成为推动拉美出口的主要力量。三是跨国公司为拉美提供了部分就业机会。联合国

贸发会议2002年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跨国公司提供的就业岗位在总就业中所占比重在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占7%、5%和8%。

然而，外资主要分布在拉美各国的出口加工业、自然资源产业和服务业，这决定了跨国公司对拉美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有限。第一，为降低成本，跨国公司实施生产的全球化安排，其拉美当地采购率相对较低，降低了跨国公司的投资对拉美产业的辐射效应，减弱了对拉美经济和工业结构向上调整的拉动作用。第二，由于拉美的贸易自由化安排，跨国公司进口产品的门槛和成本均有大幅度下降，出现了进口明显快于出口的现象，加大了拉美国家的贸易逆差。第三，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并不明显。跨国公司进入拉美后有时也会转让一些技术，在与本公司相关的基础设施中进行一些投资，并能协助东道国把一些技术实现“商业化”或“产业化”。但总的来说，以获取技术资产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并不多，因而对提升拉美科技水平的积极影响不大。

（四）外向化产业布局业已形成，但民族控制力下降

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对外贸易的扩张以及外资的产业聚集驱使拉美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产业调整中外向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一是在三大产业结构分布方面，外资最密集的服务业渐居主导地位，其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1980年为53.8%，2000年则达到67.1%；而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由36%降至27.7%；农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在经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短暂上升后回落，至2000年仅占5.1%。二是各产业内部的部门调整围绕外资和外贸展开。拉美矿业产值所占比重自90年代起迅速增加；与外贸相配合的交通、仓储和通讯业也得到发展；外资相对密集的金融服务业同样出现扩张。

然而，在适应经济模式发展要求的外向化调整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

如在墨西哥的出口加工业中，跨国公司的当地原材料采购率仅占其全部材料供给的约2%。

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农业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服务业产值超过40%作为参考指标。由此可以看出，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拉美完成了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三大产业分布符合现代产业结构服务导向性的特征。

过程中，拉美各国政府对产业的控制力下降。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下，拉美制造业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向资源加工业和出口加工装配业倾斜。与此同时，封闭经济下因规模约束和竞争不足而相对脆弱的一些民族工业部门，也因受到开放市场上的全球激烈竞争而被迫退出。上述两种合力使得拉美地区的工业布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去工业化”；在进口替代时期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到破坏，该地区产业布局越来越纳入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中，政府的产业政策效力减弱甚至完全消失。与政府的产业控制力下降形成对比，外资在拉美地区部分产业中的操控力增强，国有经济的退出现象十分明显。据统计，除原料行业中外资的市场份额保持稳定外，拉美制造业中外资企业的总占有率从 90 年代初的 48.6% 提高到 90 年代末的 55%；服务业中外资的比重也从 90 年代初的 10.2% 增至 90 年代末的 36.9%。国有企业在所有行业都出现萎缩，不仅完全退出了制造业，在服务业中的市场份额也从 36.8% 降至 13.4%。由外资主导的国家经济并不具有稳定性，不但在世界经济冲击面前弱不禁风，反而在危机时因外资的撤离而雪上加霜，出现了更大的经济动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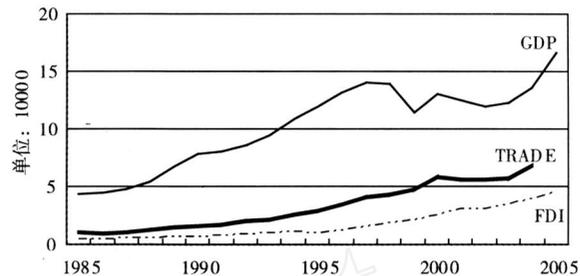
(五) 拉美地区整体国际经济地位在上升，但国家间差异在加大

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整体上拉美地区的国际经济地位得到了提升。1985~2005 年，拉美地区 GDP、贸易量和吸引的外资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在总体上都呈上升趋势。其中，拉美地区 GDP 占世界 GDP 总值的比重由 1985~1990 年的年均 5.35% 升至 1995~2000 年的年均 6.53%；2001 年以来，由于受拉美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疲软的影响，拉美 GDP 在世界 GDP 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超过 80 年代外向型经济模式调整初期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在 1985~1990 年和 2000~2005 年两个时间段内，流入拉美地区的 FDI 存量占世界 FDI 总量的比重由 7.46% 升至 9.13%；拉美地区贸易占世界进出口总量的平均比重则由 4.18% 增至 5.33%。

然而，在拉美整体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同时，因在经济基础、经济政策和实力方面存在差异，拉美国家间逐渐开始分化。图 1 显示，1985~2005 年，拉美地区 GDP、FDI 和贸易总量的标准差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拉美国家间的差距日益明显，一些国家被边缘化。具体而言，墨西哥和巴西成

为拉美经济的“领头羊”；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处于拉美经济的第二梯队；厄瓜多尔、哥斯达黎加、萨瓦尔多、危地马拉、巴拿马、古巴、多米尼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位于拉美经济的第三梯队，它们在地区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比重，或由于宽松的对外经济政策而受到外国投资者或贸易商的青睐；而其他拉美国家则处于被边缘化状态，它们在地区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

图 1 拉美经济指标的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的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1991 - 2006)* 的数据计算。

二 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社会成效

(一) 贸易与投资的“发动机”效应显现，但国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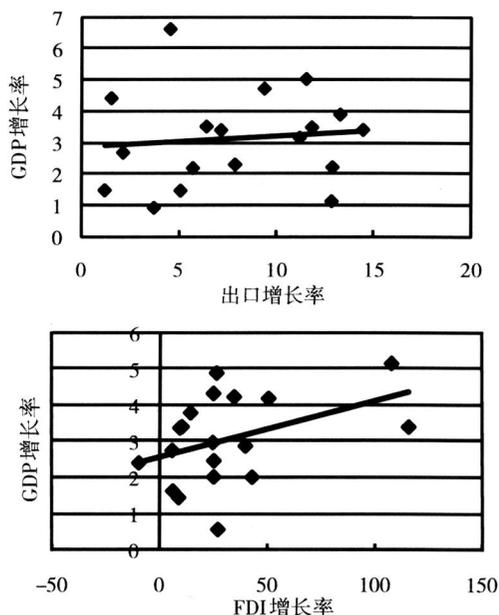
出口和 FDI 是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拉美国家，出口和 FDI 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图 2 模拟了主要拉美国家的出口增长率、FDI 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间的线性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拉美国家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年均 FDI 存量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间也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且后者相对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拉美国家的出口和 FDI 都对 GDP 有着正向的刺激作用，特别是 FDI 的流入对 GDP 有着明显的激励效应。

齐欣、王新华：《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拉美的启示》，载《对外经贸实务》，2004 年第 12 期，第 32~35 页。

尽管 FDI 相对于其他外资形式（如外债等）较稳定，但 OECD 发展中心的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数次全球性或区域性危机中，都存在外国公司抛售位于拉美的非核心资产从而撤离拉美的现象。

利用标准差指标反映拉美国家之间的分化程度。标准差越大，则国家之间的差距越大。

图 2 1995~2005年拉美地区年均出口增长率、FDI存量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关系



注：出于数据一致性考虑，图中摘录了 1995~2005 年的数据。出口与 GDP 的核算均以 2000 年不变价格为基础。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ECLAC 的 *Statistics Year Book (2006)* 的数据计算。

然而，拉美外向型增长模式在通过贸易和投资取得经济繁荣的同时，国民总收入（GNI）水平并未取得与 GDP 的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在较高的 GDP 下，居民的收入并未达到同等富裕的水平，拉美出现了“繁荣而不富裕”的怪圈。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拉美的出口结构导致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极为有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拉美较高的 GDP 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外资取得的，在外资企业良好的经营效益拉动 GDP 增长的同时，由发展形成的大量利润也由外商占有。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GNI 必然不会与 GDP 一同完成步调一致的增长，GNI 小于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GNI 和 GDP 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

（二）经济增长状况得以改善，但减贫绩效仍不稳定

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解决了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时期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来，拉美地区经济状况明显好转：1980~1985 年，拉美 GDP 和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6% 和 -1.5%；1985~1990 年，GDP 年均增长率提高至 1.7%，人均 GDP 萎

缩的现象也得到一定遏制，年均增长率达 -0.2%；整个 90 年代，拉美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前半期和后半期的 GDP 年均增长率均为 3.1%，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均为 1.4%；进入 21 世纪以来，尽管前期金融危机使得拉美经济再次下滑，但 2003 年后全球初级产品价格的高企为这一地区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使得经济重新获得较快增长。2001~2005 年，拉美地区 GDP 和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8% 和 0.9%，较之前一阶段略有下滑，但仍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水平。

然而，由于外向型发展模式所引起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和独立性下降，拉美地区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持续降低贫困率。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来，市场经济居主导地位，拉美经济保持了总体增长态势，但市场经济在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而大多数拉美国家未对社会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其结果是转型前业已存在的贫困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所加剧，该地区贫困人口持续增加，贫困率居高不下，一直未能恢复至转型前 1980 年时的水平。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拉美国家政府推出一系列旨在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政策，削减贫困是这些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不过，过度开放形成的外向型经济通过贸易条件的波动，使拉美国家的贫困与世界经济周期紧密相联。而拉美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核心竞争力的缺失，都导致其减贫绩效易受外部不利冲击的影响。90 年代以来，几次全球性或地区性经济动荡都对拉美的减贫工作形成较强冲击，该地区的减贫绩效出现逆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主要拉美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较之前期有所上升，增长与发展“脱钩”。大规模贫困人口以及贫富悬殊的存在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使得社会平衡相对脆弱。因此，发展模式转型以来，拉美社会冲突有所加剧，特别是发生经济动荡或金融危机时，往往会伴生社会危机。

（三）产业国际化水平提升，但二元经济结构持续存在

拉美确立外向型发展模式时面临独特环境，跨

以人均 GDP 的标准差衡量。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表明，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地区加权的经济波动性指标值为 2.0；转型后的 90 年代波动性指标值增至 2.6。同期，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经济波动性都在增强。

越了非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首先，拉美发展模式转型之前，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实现了由消费品进口替代为主向耐用消费品和相关资本品进口替代为主的升级，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启动基础是前期留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次，拉美发展模式转型时恰逢国际产业第三次大转移，与其同属新兴地区的东亚已经完成了加工贸易型产业的首次升级调整。为了应对国际竞争，拉美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业和资源加工业时，注重采用引进技术、更新设备及提高管理水平等措施。由于上述背景，拉美出口导向型产业具有亲资本、亲技术和亲管理的特点，这一特点促使其产业从初期发展阶段就形成了国际化中的独特定位。具体而言，由于出口导向型产业重视资本和技术，一些拉美国家形成了在特定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比较优势，如巴西在飞机制造和汽车等方面具有竞争力，墨西哥在汽车、精密仪器和设备、机电产品等方面有竞争力。此外，拉美出口导向型产业的特点还促使其培养出一批成长于初级产品生产加工部门的国际性企业，如巴西石油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等已在行业竞争中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然而，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跨越式发展使得地区内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刚性持续存在并不断加强。在进口替代时期，拉美城市化进程加速，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世界级大城市相继出现。但当时资本密集型的工业能够吸纳的只是以男性为主的技术和半技术劳动力，因此拉美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非正规经济部门不断扩大。在发展模式转型时，许多拉美国家缺失了非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出口的环节，直接跃升至对技能性劳动力需求较高的加工产业。这样，拉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了高素质劳动力相对短缺但低素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结构性失衡，未能解决劳动力市场上业已存在的过剩供应问题，失业和非正规经济仍在增加。较高的失业率和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继而使得贫困加剧；而贸易结构相对集中，外资的溢出效益相对有限，使得出口和外资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与福利仅局限于相关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拉美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据 ECLAC 统计，在能获得数据的拉美国家中，所有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 0.4，半数以上的国家“高度不平均”，而其余国家收入“差距偏大”。

（四）部分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但公共产品可

获性差距拉大

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大量外资流入拉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交通、仓储和通讯等基础设施服务领域。据 ECLAC 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拉美地区吸引的外资中有 24% 投向上述部门，这些外资补充了拉美公共投入的不足，使得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以电信业为例，西班牙电信等外资电信企业自 90 年代起陆续进入拉美市场，它们在电信设施方面的投资提升了该地区电信服务的整体可获得性。

然而，与政府投资公用事业的出发点不同，外资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这会加大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差距。一方面，市场导向会促使外资最初会关注富裕阶层的需求，而后才会逐渐转向贫困人口，这一过程产生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公共产品可获得性的差距。另一方面，市场导向会促使外资率先流向市场条件和投资环境良好的国家或地区，这也会加大公共产品可获得性的地区或国别的差距。

收入差距导致可获得性差距加大的情况，往往容易使社会陷入“收入差距—可获得性差距—新的收入差距—新的社会问题”这样的恶性循环中。以教育产品为例，ECLAC 的统计数据 displays 不同收入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劳动者的素质，进一步决定其未来就业。在现行经济社会体系下，拉美形成了“穷人子女—难以接受高等教育—劳动素质低—难以就业或难以得到高薪—新生穷人”这一恶性循环。此循环又通过三条路径向外辐射：第一条路径以新生贫困为传导途径，使社会差距持续存在或加大，二元经济结构得以刚性保持；第二条路径以失业为传导途径，高失业迫使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挤出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致使公用事业投资不足；第三条路径以消费为传导路径，由于收入差距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处于“金字塔型”经济社会结构顶层的拉美富裕人口的消费能力强，但消费欲望很低，而处于底部的贫困人口的消费欲望高，但消费能力弱。其结果是拉美

全毅、张旭华：《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东亚和拉美地区的比较》。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tdbbs/dispbbs.asp?boardid=12&id=149507&page=1&star=1

国际上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基尼系数在 0.4~0.6 为“差距偏大”，0.6 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市场内在需求十分有限，生产性企业只能转向国际市场，对外依赖性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降低。

三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经济方面，外向型发展模式的两大支撑——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内生因素，它们对经济形成直接推力，通过市场的自由配置就可以促进一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实现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了国民经济扩大循环、规避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下的“短板效应”，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外向型发展模式也通过贸易条件和资本流动将外部变动导入国内经济中，增强了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使得一国更易受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往往会增加“小国经济”的波动性。

在社会方面，贸易和投资是外生变量，它们通过传导机制对社会指标产生影响，只能对“发展”形成间接推力，无法直接消除或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因此，从社会角度看，外向型经济模式并未解决进口替代模式下的发展瓶颈问题，良性社会成效的最终出现有待于适当的政策干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推行外向型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增长模式选择及其出现的问题与拉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而拉美国家在外向型发展模式调整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产生的问题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研究这一问题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意义。

第一，降低经济的对外依赖度，提高内需的经济刺激作用。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在扩大中国的贸易额和引资额的同时，也引发了与拉美类似的对外“依赖度”问题。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超过80%，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水平。为了规避对外依赖度过高而产生的众多潜在风险，中国应适时把关注点转移至国内，更多地通过内需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更多地把目光转向国内市场，重视并致力于国内市场的开发和升级，激活国内市场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作用，使内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二，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走出去”的升级。拉美在发展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同时，囿于原有的比较优势，结果导致对外部门的“数量扩张”超出“价值扩张”，贸易和投资无法

实现跨越式的循环。针对拉美已出现的这一问题，中国应在当前贸易和投资已达到一定规模的前提下，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并推动“走出去”的升级，扩大对外部门的良性循环范围。

第三，加强对外贸和外资的引导，提高对外部门和企业的“溢出效应”。总结拉美外向型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应看到中国与拉美类似，也同样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样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目前，中国也仅仅是贸易大国而非贸易强国；中国以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格作为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以高投资、高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支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中国应对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弊端及由此引起的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并加以修正，积极稳健地发展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对外资和外贸的产业引导，促使对外部门对宏观经济整体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外资的地区引导，规避开放导致的地区差异加大的潜在危机。

第四，加强外向型经济模式下的适应性调整。拉美在从进口替代型发展模式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时漏掉了重要的一个环节，即非技能型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快速发展。这一环节缺失使其出现了过度城市化、严重贫困和非正规经济刚性存在等社会问题。与拉美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展的外向型出口加工业恰恰利用大量存在的低技能、非熟练劳动力，通过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将农民引入制造业，是一种自然的产业调整和城市化过程。但是，这种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中国处于国际生产分工中的最低端，成为“世界加工厂”，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十七大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等重要纲领性文件已经一再重申，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中国当前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面临升级产业结构和消化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双重需求，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为了创造良好的增长和发展环境，中国应在坚持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快劳动力的培养和训练，加大对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从而在现有模式下一步步地解决国内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逐渐适应产业的升级和调整。

（下转第35页）

(上接第 28 页)

第五, 加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协调。拉美的历史经验表明, “增长”并非必然促进“发展”, 经济并不一定能解决社会问题; 在外向型发展模式下, 自由市场经济很可能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 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吸取拉美的教训, 中国除了要根据增长需要适时调整经济政策以外, 还应根据发展需求推出恰当的纠偏性的社会政策 (如提高对贫困人口发展的支持力度, 加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等等), 以此切断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出现的社会问题的恶性循环, 使得增长最大限度地带动发展。同时, 中国在制定社会政策时还应注意创造“机会”的平等性, 避免出现拉美国家由于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公共产品可获得性存在差异的问题, 实现资源配置的“公正”和“效率”相结合。

主要参考文献

1. J.L.Machinea and C.Vera, “Trade, Direct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Policies”, ECLAC Informes y Estudios Especiales Serie, 2006.
2. Rajagopal, “Where Did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Drive Latin American Economy: a Cross Section Analysis”, in *Applied Econometr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ED.)*, Vol.6 - 2, 2006.
3. 苏振兴:《苏振兴文集》,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
4. 吴国平:《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 载《中国经贸导刊》, 2006年第3期。
5. 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与教训》, 载《紫光阁》, 2006年第5期。

(责任编辑 蔡同昌)